

# 「回首百年民國」學術研討會紀實

王文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

「回首百年民國」學術研討會係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 2012 年 1 月 11 日至 13 日舉辦，主要由該所同仁發表文稿。這不是成果的展現，而是回顧與前瞻，想要以新視野提出新觀點，將中國近現代史置放在東亞史及世界史的框架下重行探討、提出疑問，關注於斷裂與延續，思考未來的走向。

首先由汪榮祖教授發表主題演講「對民國史分期、議題、書寫的一些看法」。他談到，歷史學者為了書寫的便利才有歷史分期，這是受到西方歷史發展影響的產物。民國史是一個相對來說較清楚的概念，民國肇建已經百年，國號迄今未變，但已經能清楚地劃分為三個時期，一是創始到 1928 年，一是 1928 年之後到 1949 年，一是 1949 年迄今。對當前的歷史學者來說，如何撰寫 1949 年之後「一個中國」表述下的民國史或是中國現代史，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。但當前研究對民國史尚未有清晰的圖像，尤其是研究領域中有相當多必須避諱的禁區，即便當前狀況相對於過去已經大為改善，但仍被迫出現通史性質的撰述，力圖提出宏觀的詮釋與見解，因而不免產生時近多詭、時近難斷與我族中心主義的缺陷。百年來民國史的研究重心，由政治外交史為始，逐漸向經濟史、思想史、社會史移轉，到現在則以新文化史為風尚。近史所早年以整理檔案和編排檔案為主，現在也出版了許多史料集，但沒有太花時間在整理好的史料基礎上發展研究，如《中國對西方反應資料彙編》便

是一例。近史所還有未竟全功的現代化研究計畫，如能持續進行下去，或許能有許多例證用以修正西方的現代化理論。另外，以人物研究歷史或也是一個很好的取向。當前民國史仍有其他方向能加以開拓，像是重要的政治人物、具有爭議的人物、各階層人物或是小人物、人民苦難史的研究、醫療史、生態史、環境史與城市史的研究和民國史與環球史(Global History)的掛勾，都是方向。近代以來，歷史寫作趨向於以社會科學辦法研究歷史，成了社會科學報告書，現在則重拾歷史敘事方法，架以社會科學方法釐清事實，以實證史學為主，書寫故事，這幾年有相當多新文化史的很好成果。它有新的題材，新的關懷與新的書寫，關注小人物以充實歷史的內容。最後，汪教授提出研究計畫分工、統合及擴大近代史研究班子的建議。

第一場是「傳統再興與中國近代史的書寫」，有三篇論文發表。第一篇是呂妙芬教授的〈清代理學研究的新視野〉。文中提及，中國崛起使得儒學儼然成為新中國的新認同，枯骨有了新生，與現代企業、統治管理和中國推動有密切關係。因此近年來研究也開始反思，傳統不見得是中國失敗的原因，反而能自傳統中找尋當代中國崛起的長時期因素。傳統的其中一條脈絡是理學，若我們注意到宗教跟社會的影響，能發現理學在清代並未消微，反而留下相當多的文獻，提供了研究的素材。第二篇是黃克武所長的〈荀子與清末民初的思想變遷〉。

他提到，傳統跟現代是交織與互動的，怎樣思索世俗化的內涵與意義便是要點。當前思想史研究轉向概念史，討論文化交流、文化轉型與詞彙轉換，找尋中國世俗化的過程，並將其置放於傳統與現代互動的角度，進而與其他傳統做比較。第三篇是雷祥麟教授的“Writing Medical History for a Living Tradition or, Rescu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oth the Nation and Nature”。文中反思，如果我們承認中醫是一個活著的傳統(Living Tradition)，那應該如何撰寫他的歷史？現代的中醫史又與以往的現代中醫史有何不同？1930年代的中國醫學史研究，有許多作品一方面要強調中國醫學的民族特色，但一方面卻要將其博物館化，認為那是即將死去的傳統。臺灣自1980年起醫學史研究興起，李貞德認為臺灣的研究跳脫過往框架，不再追尋是否最先發明某事，而以人類學式的方法理解。中醫作為一個活著的傳統，其與現代社會具有綿密但不易見的關聯，具有積極而正面的意義。楊瑞松教授回應道，三篇文章都談到延續性的問題，傳統看來是存在的，或許在各種時間下被不同地對待。活著的傳統或許也是變動中的傳統，得適應現代生活，我們能釐清發展的軌跡，知道這些如何被現代所挪用、轉化、形塑與展示。汪榮祖教授認為概念的不同很值得研究，晚清變法的人很推崇荀子，這是因為他的觀點是進化論的，能對應儒家往後看的傳統。另外，中西醫或許是主觀的分別。康豹教授提到，

宗教或許是三篇的交集，能以此加強對話。佐藤將之教授強調荀子研究的重要性，荀子對學術史的轉換也能看到傳統漢學對哲學的轉換，目前對中日韓三國荀學轉換的歷史尚未有研究，能加以開拓。

第二場是「消費社會的形成」，有三篇論文發表。第一篇是巫仁恕教授的〈從消費來看明清江南城市的空間變遷〉。文中提到，中國人的消費習慣有其傳統與延續，消費行為會改變城市的風貌，以往討論城市史，可能會遇到中國的城鄉沒有區隔的說法，然而利用當代社會學的調查辦法能知道，城鄉的最大差異是消費行為的不同，消費空間與遊憩場所的出現、分化與區隔逐漸展現。另外是無形的社會空間的出現，如私人休閒空間、旅遊空間的塑造，使用者的身分在此有了區隔。第三是性別對消費空間的影響。本文也利用後現代地理學中談及空間層次的概念，包括其實踐、社會生產與再現的城市空間與利用，而消費帶來相當重要的城鄉區隔，尤其是時尚的差異。第二篇是賴惠敏教授的〈清末民初北京毛皮工商業的變遷〉。她提到，毛皮為服飾貴賤的區隔，也是一種時尚。從恰克圖貿易檔案中能見獵捕影響環境的痕跡，俄羅斯因為獵殺動物數量太多，破壞環境，因而毛皮進入中國的數量減少，外蒙古則產出羊皮等素材，另外就是海豹皮等海洋生物的皮毛進口，成就了北京成為毛皮製品與毛皮染色的中心。恰克圖貿易的資料相當豐富，不僅能補足當前研究

的缺口，也是可比美廣州十三行的資料，或能從中窺見中俄貿易的一豹。第三篇是連玲的〈城市新樂園：近代上海百貨公司與城市文化〉。她談到，大量生產與機械生產促使新型銷售型態的變革，西方百貨公司便是這樣情況下的產物，要使人密集接觸商品，要賣得多、賣得快，迅速銷售庫存。但上海出現百貨公司的銷售型態，並沒有西方生產革命的問題，因此必須跳脫西方的框架，重新塑造城市革命。本文還談及消費空間，是一個消費空間的內向性，將所有人關在房子裡消費，從逛街變成是逛公司，改變了人與人、人與物的互動。盧漢超教授的回應稱，中國城鄉在 19 世紀前或許不如西方一般區隔清楚，但因消費文化的變革，城市的優越感逐漸出現。皮毛確實是奢侈品，賴教授一文對於階級和服飾的區隔、價錢都談得相當多。而關於百貨公司，南京路是指標性的商業集散地，但對一般市民這樣的地方有怎樣的意義，是否其他區域的轉銷或是零售已經能滿足一般百姓所需。消費文化對中產階級的形成與社會風尚，又帶來怎樣的影響，也能加以探討。汪榮祖教授提出，城市除了消費之外，還要注意服務業。游鑑明教授提出，性別的消費圈是否還能再加闡述，而城鄉消費的區隔或許有其彈性。蔣竹山教授提出，物質文化也有商品全球化的面向，或許也能從此加以嘗試。陳耀煌教授補充，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才能產生價值，物資流通不會產生價值，因此中共建政後批判城市僅是

消費的城市，不是生產的城市。

第三場是「轉型的政治史、政治史的轉型」，有四篇論文發表。第一篇是林美莉教授的〈近代中國財政轉型中的知識與政治〉。本文利用孔祥熙的資料解惑，要談個人的建言透過孔祥熙於國內實施的情況，舉的例子是民商法的制定。而會計師與稅制在這段時間的變化，也是透過檔案解讀重現。透過知識 / 體制，生計 / 國計的並列安排開始去理解是怎樣的機制，可以整合人才面對世界壓力與挑戰。第二篇是孫慧敏教授的〈法律的政治史：反思民國法律史裡的「中央」與「地方」〉。她談到，各代法律史的斷代來說，民國法律的研究相對地不被關注。當前法律史的研究，也通常較關注司法制度與法律觀念及法律跟憲法關係的研究，是一個與政治相當疏離的脈絡。辛亥革命之後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動搖，關係重新建構。中央的命令在地方上能有多少落實，如以律師甄別為例來看，中央的力量是能向下延展的。第三篇是余敏玲教授的〈「教育」與政治：蔣毛時代國共宣傳之比較〉。她首先定義，此處所指的教育並非是學校，而是對內宣傳，所談的內容是革命。國民黨的宣傳在北伐時期或許做得較好，然而這大概不是國民黨之功，而是共產黨的幫助。國民黨的宣傳仍以知識分子為對象，重視政治而非經濟，也忽略一般庶民百姓，對爭取民心頗為不利。共產黨的自我批評則修正了許多宣傳上的問題，完成了宣傳的一元化，善於主

導議題。第四篇是劉季倫教授的〈「權力」的轉型：從帝國到人民共和國〉。他說，國王與臣民的緊張關係，發展出西方法律的支配與政治制度。但中國的情況與西方不盡相同，君臣關係是「格」來規範的。如海瑞即使批判皇帝，仍是忠臣的代表，他忠於君主，所以直言，這並非西方的上下關係，但人民共和國是要消解所有人際關係的，壓制小我並融化於大我。呂芳上館長的評論提到，盼望討論會的論文能再多加深入地反省與檢討，並提出將來能發展的路徑。過去幾十年來政治史研究受到政治干擾甚深，1980年代末起政治史終於擺脫如此困境，實際上當前臺灣正是研究民國政治史的最好時機，有了新資料，或是利用新方法。傳統與現代、西方與東方、中央與地方、戰爭與動亂、制度的轉化、黨國體制的運作都是很能討論的方向，但國內研究頗受理論風尚的影響，如何思考與利用在解釋上便頗能討論。朱法源教授表示，無論是由上而下或是由下而上的變革，似乎都是由外而內的，是由西方所帶來的影響。游鑑明教授補充道，應注意《宣傳週報》，另外婦工會也透過《婦女》為媒介做宣傳。國民黨來臺之後，深刻地修正其宣傳工作，與戰前已經有相當大的差異。張玉法院士表示，第一，目前研究零碎化，這與個案研究並不相同，希望能將這些研究安放在某一個脈絡或位置。第二，有些研究則是籠統化，破除時間與空間的先後，這或許不是史學應該做的。史學應該有

起迄，也不應破除時間隨意分類，應該扣緊時空環境討論。第三，有些研究繁瑣化，將所有言論談一遍，這似乎有些多餘。

第四場是「西潮與現代政治：思想及制度」，有三篇文章發表。第一篇是潘光哲教授的〈「世界史地」與「國際法」知識和近代東亞「地理想像」的生產、流通與嬗變：研究與展望〉。本文指出，知識倉庫中能產出一種共同知識文本，討論 19 世紀以來的東亞，這些知識人擁有哪一些共同的知識文本，是擁有了怎樣的共同了解，或是共同的認識。本研究以知識人為主，很遺憾無法做到對於「無語人」的討論，但還是嘗試透過價格、印刷等辦法，還原其知識流通的面貌，《萬國史記》、《萬國公法》便是文中所舉的例子。第二篇是林志宏教授的〈「帝國」邊境和知識的政治學：1930 年代關於滿蒙論爭的初步考察〉。本文先討論近代滿蒙的論爭，接著思考自 1905 年日俄戰爭以來的日本大陸政策，最後討論日本如何將滿蒙視為生命線與納入知識系譜，觀察明治維新後，日本在教育上的培育，如何影響對滿蒙的認識與推動殖民政策，最後談到中日的滿蒙論爭與國民帝國（日本）、古典帝國（中國）的衝突。第三篇是許婷怡博士的〈晚清執政團隊與「議會民主」建構：以達壽、于式枚為例〉。她以故宮軍機處與《中國認識西方列強彙編》為主，比對資料，發現一些差池。本文討論第二次出洋考察時的達壽與于式枚。前者是滿人，擁護日本式的民主；

後者則較採公平的觀點，認為中國有由上到下的統治脈絡，因此憲法並非是新的事務。最後放入孔恩的不可共量性的概念，來討論典範轉移。汪榮祖教授回應，很肯定潘光哲共同知識文本的說法，但中日韓三個地區對共同文本的想像或不盡相同，而本文夾雜對研究的評價；林志宏的文章切入點太多，拋了相當多議題，都能繼續深耕。朱法源教授提出，林志宏以二分法劃分國民帝國與古典帝國，但因其英文都是 National，因此很難區隔。許婷怡的文章談到認識西方以及中國回應的問題，頗有價值，是執政團隊對當時的切入點，跳脫立憲與革命的二分法。黃克武所長提問，希望林志宏能說明如何做出與日本學者不同的觀點，另外盼望許婷怡能對不可共量的實際內容多加說明。

第五場是「1949 年以後的中華民國」，有三篇文章發表。第一篇是林滿紅教授的〈國際地緣政治、民國史與金馬地位〉。本文提出，中華民國政府仍有臺灣為領土，並非流亡政權。接著以時間為脈絡，闡釋臺灣主權與美國對華政策的更變，認為臺北和約是一個對於臺灣所有權的移轉，其依據是〈舊金山和約〉為母法，使得臺灣受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統治，並與持續受中華民國統治的金馬連為一體，成就今日的局面。第二篇是陳儀深教授的〈從 1950 年前後的美中臺關係看臺灣地位問題〉。文中舉出葛超智、國民黨及其他各方觀點，呈現當時各方對臺灣地位的不同觀察。美國有一段時間

是完全接受開羅宣言的，然而因為韓戰的爆發，在西太平洋戰略考慮下，才盼望臺澎能置外於紅色中國。舊金山和約及臺北和約是處理臺灣的關鍵，只是關於地位的問題仍受凍結，所以臺北和約就是臺灣地位未定論的再確認。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，用本土代表修改憲法為一次大的革命，對「中華民國在臺灣」有了新的開始。第三篇是許文堂教授的〈臺灣法律地位與臺灣人國籍的再思考〉。本文以戰後臺灣在中國軍事占領下的特殊情況為例，套用國際法上的概念，討論戰後臺灣一地原居民所屬國籍的轉換，以及其海外僑民在遭遇國籍轉換期間的特殊問題，並舉澀谷事件為例加以說明。張啟雄教授回應到，在目前兩岸關係框架下，如何與中國大陸互動，將會是最重要的關鍵，如果只有論述，或許不能解決問題。許文堂教授回應到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時已經脫離了原有土地，稱其為流亡政府並無不妥。1972年中國大陸與日本建交，中共明白表示臺北和約已經無效。臺灣主權或許屬於不完全繼承的狀態，因此1991年修憲時仍使《中華民國憲法》成為自由解釋的憲法。朱宏源教授回應，主權是空泛的稱呼，或許以「交往能力」來說是妥適的，另外盼望北京政府能承認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並未完全消滅，正視歷史事實，共同合作。盧漢超教授提問，1958年中共炮擊金門乃為了維持內戰狀態，是否有此一說？張啟雄教授表示，1950年代的中共是血洗臺灣，因此這個戰

爭狀態是真的對臺動武。許文堂教授表示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臺北和約其實在領土上是有相似的作法，限制條約適用範圍。林滿紅教授補充道，領土轉讓屬處分性條約，並不因承認改變而廢止。

第六場是「政治、經貿、性別史之回顧與前瞻」，有四篇文章發表。第一篇是李宇平教授的〈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的區域性經濟特徵〉。文中提及，過去經濟史幾乎以國際貿易為主，以對手國貿易為主。然而，1930年代的貿易分為帝國內貿易及帝國外貿易兩類，前者加強與殖民地間的關聯，後者加強與其他帝國的通商網絡，地域研究介於國家與全球之間，是值得開拓的研究範圍。本文提及的經濟大恐慌是世界性、擴散性的，能藉此理解對各區域經濟結構的衝擊，開拓新的視野。陳慈玉教授回應道，當前歐美也開始注意區域經濟，如糧食流通等。經濟史當前跨越國境的史觀，其難度相當高。19世紀之後，中國對外門戶開放，亞洲才被編入以西歐為中心的世界體系。從水泥的研究來說，經濟大恐慌的情況來看，也確實如此，全球的情況確實對區域帶來相當大的影響。第二篇是游鑑明教授的〈歐美學界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〉。西方學者的婦女史通常被當成是典範，近來跨向性別史、文化與社會的架構下觀察，談到Susan Mann、Gail Hershatter、Dorothy Ko、Francesca Bray等研究及其與典範、主體、再現相關的議題，並談及婦女史料的蒐集與

判讀，更吸引大家進一步追問，或是透過男性、口述等多重方向追索，豐富婦女史、性別史的內涵。西方學者大量利用史料，也談理論，或將婦女問題放在全球化的大視角下思考。柯惠鈴教授回應道，對於西方的典範或許也能有新的提出，盼能有所創見而非複製或是重製，另外全球化的研究方法也呈現了婦女史研究的多面性。面對於此，我們能推動跨學科的思想、文本解讀的交叉與多樣，破除中西之別。第三篇是張力教授的〈軍事史研究的新視野〉。本文從美國的學術期刊為本考察其由盛而衰的情形。以往軍事史一直是歷史專業的主流，軍事部門裡也有軍事史的研究機構，越戰之後的反戰影響了軍事史研究，新的歷史潮流關注底層與大眾，也衝擊了軍事史。新軍事史推動軍事與社會的交互研究，使得研究範圍擴大，另外也希望拉進新文化史、性別史的脈絡以圖自存。國內因檔案開放的問題，無法大量利用，因此目前國內也多為新軍事史。劉維開教授回應道，軍事史的範圍與分野或許能加以思考，當前軍事史通常被混雜在政治史裡討論，狹義的軍事史來說當然產出很少，但如果以新軍事史來思考，那就很多了。除了國防部的資料外，還有其他史料裡有軍事的資料，然而軍方缺乏研究動力，其他學校正規課程中幾乎沒有軍事史課程。張瑞德教授提到，能就這兩天的討論反思專史或是認同的分隔，或許最重要的是研究本身作得不好，而不是冷熱門的問題。第四篇是陳耀煌

教授的〈在共產中國發展歷史：西方毛澤東時代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〉。他提到，地方研究是當前西方研究中共的趨勢，將焦點自上層移到下層。近年來中國崛起，因此開始討論中國農村自身動力與群眾基礎對經濟動能的影響。本文也比較蘇聯的共產主義和所謂具中國特色的共產革命，依賴一窮二白的農民典範。劉季倫教授回應道，史無定法，由史家的角度各自表述，從不同的系統闡述，而會有他自己的意義與看法，當然也會有缺陷和問題。每一步的發展都是下一步的臺階，陳耀煌的研究為未來作了相當好的準備。張志雲博士補充道，在英國軍事史仍是很好的傳統，目前他們正逐漸向非西方戰爭的研究。盧漢超教授提到，有些婦女成了寡婦後不願再嫁，或許也有其主動性，另外也有對五四時期概念的反動；軍事史也有類似的趨勢在翻案，要提出中國在軍事上的強盛，這或許也是中國崛起後的變化。張玉法院士提到，無論研究什麼都要掛在冠冕堂皇的架構裡，要讓大家看到、知道。臺灣研究中共史或許因為自由的關係，能超越中國大陸，臺灣史的研究則必須跳脫主觀，才能更公正的看待。

第七場是「近代文化的傳播與轉譯」。第一篇是康豹教授的“Broadcasting the Tao: Religion and the Mass Media in Modern China”。第一部分是研究回顧，接著談到研究這個議題的動機，主要來自於對宗教菁英的興趣，另外也討論報刊及刊物，能見其

發行廣泛。除了蒐集之外，也有方法論的討論，包括推動管道、出版文本、文本內容變遷、讀者設定、表現方式新舊如何等等。因此要理解參與的人、資金運作的方式、傳播的辦法、經營模式、版本及分類的方式、信仰與價值觀有沒有變革、也能與其他研究群的朋友一同交流。第二篇是張哲嘉教授的〈「跨文化」觀點下的「中國法醫史」〉。他說，現在近史所正在推動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大計畫，其中包括了持續 (Living Tradition)、新生 (New Born) 與消散 (Dead Body)。法醫是一種 Dead Knowledge，在西方的衝擊下很快就消失了，而他在近代的轉型中擺放在如何地位，值得討論。以往的研究基本上不會超越《洗冤錄》，現在則添加了其他社會科學的元素，而目前似乎有轉往全球史的嘗試，其關連是西方的法醫觀點。醫學與法律要產生連結，便是西方概念的呈現。最後，討論中國檢驗史的發展，以及其與國家統治的發展脈絡的關係。第三篇是張寧教授的〈異國事務的轉譯：近代上海的跑馬、跑狗、回力球賽〉。她說，文化轉譯是現代中國相當重要的議題，不過現在研究多集中於政治意識，對文化方面的討論卻不大多，對異國事務、組織與活動在中國的變遷與變化的研究，頗具研究價值。接著談及體育與運動的差別，更深地談到國家建構、殖民社會與城市休閒等議題，也提及運動社會學的引入，最後以跑馬、跑狗及回力球為例加以說明。第四篇是賴毓芝教授的〈日本

在中國近代畫史開展與建構中的位置〉。本文以中日關係史的角度關照繪畫的發展，19世紀下半，日僑人數超過英國，日本物質文化成為重要的元素，也影響了中國文化及繪畫的發展。1929年開始的全國美展與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，藝術逐漸被吸納進國家統制的一環，但中日戰爭並未截斷中國畫受日本畫風影響的事實。地理雖關於區域，卻也包括整體價值的意義，實際上有其流動的特性，而交流研究是蘊含空間的向度，其中包括許多符號，對變動、碰撞區域的研究，更能了解文化的內蘊。第五篇是洪秋芬教授的〈中日戰爭時期臺灣社會的流言蜚語與保甲運用 (1937-1945)〉。文中主軸是日本如何利用保甲防制流言蜚語的傳播，論及殖民當局推動同化政策及皇民化政策，在中日戰爭爆發期間，保甲強化其力量，使合於戰爭所需。有戰爭便有流言，如何取締、消滅蜚語，削減對殖民當局不利的內容，創造對殖民當局有利的風聞，透過保甲力量為之，以穩定民心，便是本文重點。本場未設評論人，由大家各自發言。

洪秋芬教授提到，文化轉譯是一個相當好的切點。賴毓芝教授談到，傳播媒體與技術本身對宗教接觸的影響又是如何，從木刻到石印的筆觸呈現，是革命性的進展，藉此符合、恢復原有的繪畫傳統。文化交流的版塊交接需要理解其接觸、衝突與轉變，但法醫卻像是毫無招架便消失了，相當特別。張寧教授提到，空間或許有實體與抽象空間的



差別，上海便是文化接觸地帶，變動中的文化交流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切點，新的分類系統和專業化也隨之出現。張哲嘉教授提到，中國有其原生「土壤」能發展西方傳來的東西，使其融入社會。另外，中國在學習上除了強國外，也向其他小國、弱國學習了新的事物，如向日本學習繪畫便是。文化和國家控制與互動又是怎樣面貌，也確實是值得深入的議題，並開啟對未來的可能性。康豹教授提到，討論跟報告有許多交集，很樂觀地感覺本所仍有許多的新方向，而非沒有目標。傳播就是很能多談的議題，跟消費也能有所關連，都能多予留意。另外，我們比較

沒提到的是權力，包括國家、菁英的權力還是能繼續發展的方向。

本次會議由大多數近史所同仁發表論文，以交互了解、相互討論、增進彼此認識，俾利於日後的交流與互動為始，也在此一目標的達成下，帶著與會會眾的期望與指教後落幕。在討論中，大致也能察見當前近史所的主要研究方向為何，更能觀察到目前近史所成員的研究中，與國際學界在文化史、社會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是較為接近且著有成績的。最後，本會議便在這一個沒有評論人，由大家交互討論的氣氛下結束。